

英汉翻译 理论与实践

毕秀英 张泽芬 张云霞◎主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主 编：毕秀英 张泽芬 张云霞

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飞鸿 王会凯 王丽丽 王雪玲 史 忆

史春柳 乔 阳 任秋红 张秀华 赵一丁

海 盛 梁海霞 崔蓉蓉 韩欣华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 毕秀英, 张泽芬, 张云霞主编.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1104-997-8^{*}

I. 英… II. ①毕…②张…③张… III. 英语—翻译理论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2077 号-----

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主编 毕秀英 张泽芬 张云霞

*

责任编辑 张华敏

特邀编辑 付雨欣 宋清贵 陈长江 钟 波

封面设计 跨克创意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http://press.swjtu.edu.cn>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成品尺寸: 185 mm × 260 mm 印张: 26.875

字数: 90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04-997-8

定价: 44.00 元

图书如有质量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翻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经过几年的翻译教学实践之后,编者把相关的翻译理论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本书中收录了成功的、深受学生喜爱的翻译技巧和方法,包括词语的翻译、句法翻译、篇章翻译、辞格翻译、文体翻译(含多种译本比较,译者风格比较)等。

本书的编写经历了两年。在广泛收集素材的基础上,经过同行老师和从事翻译工作的几位同事的共同努力,探讨了各种翻译方法的可行性和实用性,然后把我們共同探讨得出的经验和理论知识融入该书,使之内容更丰富,更具趣味性和可操作性。

翻译实践是我们学习翻译的一条主要途径。因此,本书在介绍翻译理论的基础上,重点对各种翻译技巧加以探讨,同时在技巧篇的每个章节后配有相应的练习,并在本书末附有参考答案,供读者参考练习。本书通过丰富的知识讲解,拓宽了学生学习翻译的途径,以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和信心。

本书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创新: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创新,编者通过对多种译本进行比较,进而对不同的翻译方法和技巧进行分析;其次是研究对象,编者把文体学、修辞学与翻译学融为一体,探讨了文体翻译、修辞翻译的研究新领域。

本书由毕秀英、张泽芬统稿。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史忆编写了第六章第二、四节、五节和第八章第二节,约 5.1 万字;梁海霞、史春柳编写了第九章第一节,各约 5.1 万字;王飞鸿、海盛编写了第五章第六节、第八章第三节和第九章第二节,各约 5.1 万字;张云霞编写了第七章和第九章第六、七节,约 5.1 万字;张泽芬编写了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章第五节,约 7.4 万字;毕秀英编写了第六章第六节、第九章三、四节,约 7.6 万字;韩欣华编写了第二章第一节,约 3.1 万字;王会凯编写了第一章,约 5.6 万字;王丽丽编写了第二章第二、三节、第三章第一节,约 5.1 万字;王雪玲编写了第二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七节、第六章第一、三、八节、第九章第八节,约 5.1 万字;乔阳编写了第三章第二、三节和第四章第二节,约 5.1 万字;任秋红编写了第四章第一、三、四节和第五章第八节,约 5.1 万字;张秀华编写了第四章第五、六节、第五章第三、四节,约 5.1 万字;赵一丁编写了第三章第四、五节、第五章第一节,约 5.1 万字;崔蓉蓉编写了第五章第二、五节和第八章第一节,约 5.1 万字。此外,练习参考答案和参考文献由全体成员共同完成。

本书主要适合于各企事业单位、研究所、大学研究生、本科生和大中专院校从事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的工作者和学生阅读参考。

本书中引用了部分同行和有关专家的文献和资料,在此向所有原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如有不妥之处,诚望广大读者、同仁不吝指正。

编 者

2008 年 3 月

目 录

理 论 篇

第一章 概 论	1
第一节 翻译的性质、方法和标准	1
第二节 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	4
第三节 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命题	20
第二章 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	25
第一节 译者的知识储备	25
第二节 译者的主体性	37
第三节 工具书的选择与使用	48
第四节 电子资源的利用	55
第三章 汉英语言对比	63
第一节 汉英文化差异	63
第二节 汉英词义差异	65
第三节 汉英短语对比	67
第四节 汉英句式差异	81
第五节 汉英语段比较	92

技 巧 篇

第四章 英汉翻译中词义的确立与表达	100
第一节 词语的基本对等与不对等	100
第二节 词语转换	103
第三节 增词法	109
第四节 减词法	115
第五节 正反译与反正译	122
第六节 词语的音译、意译、音译+意译、象译和零译	134
第五章 句法翻译	140
第一节 换序译法	140
第二节 断句译法	142
第三节 转句译法	144

第四节	合句译法	146
第五节	缩句译法	147
第六节	转态译法	149
第七节	无主句的译法	150
第八节	省略句的译法	152
第六章	成语翻译	157
第一节	英语成语汉译	157
第二节	汉语成语英译	159
第三节	翻译中汉语四字格的使用	162
第四节	翻译中英语成语的使用	165
第五节	谚语翻译	167
第六节	惯用语翻译	172
第七节	歇后语英译	175
第八节	俚语翻译	177
第七章	篇章翻译	181
第一节	衔接	181
第二节	连贯	182
第三节	意向性	184
第四节	英汉对照文章节选	186
第八章	修辞与翻译	191
第一节	修辞与语义	191
第二节	汉英修辞比较	208
第三节	英汉辞格翻译	219
第九章	不同文体的翻译	245
第一节	小说翻译	245
第二节	散文翻译	291
第三节	诗歌翻译	309
第四节	科技英语的特点与翻译	338
第五节	新闻英语翻译	343
第六节	广告翻译	376
第七节	商标翻译	382
第八节	菜谱翻译	387
练习参考答案		391
参考文献		419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翻译的性质、方法和标准

一、翻译的性质

参照国内的有关著作，我们可以初步给翻译下这样一个定义：“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这句话从字面上来理解并不难，问题是在实践中怎样运用。现在有个句子：The heavily laden infantry, though enjoying a superiority of six-to-one, simply could not keep to schedule and lost 60,000 men in one day. 我们怎样用汉语来表达英语句子里的思维内容呢？

首先，我们通过查阅一些词语的含义和分析句子中的一些结构，在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与英语原文内容相对应的汉语意思：“这支负载很重的步兵，尽管享有六比一的优势，完全不能遵守时间表，并且在一天内损失六万人。”

然后，在我们脑子里把这个意思加工——按照事物的逻辑关系和按照汉语的使用习惯——进行调整和修改：

① Heavily laden 负载很重的：这实际上是说明为什么“完全不能遵守时间表”的原因。可以移动一下，放在“完全不能遵守时间表”的前面，并且加上“由于”，表示这是原因。

② Enjoying a superiority of six-to-one 享有六比一的优势：六比一指的是数量上的优势，“在数量上”这四个字可以考虑写上。当然，也可以不写上。

③ Simply could not keep to schedule 完全不能遵守时间表：负载很重是原因，（直接）结果就是行动不便，（进而）造成时间上的耽误，即“完全不能按照时间表的要求行动”。也可以说是“根本无法按时行动”。

④ and 并且：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这个 and 不是表示并列关系而是表示因果关系，说明由于行动迟缓打了败仗，可以改为“因而”。

经过上述调整，句子变成了：“这支步兵尽管（在数量上）享有六比一的优势，由于个人负重量很大，根本无法按时行动，因而在一天内损失六万人。”到此为止，在表现原文含义方面是大致完成了，在汉语句子组织方面则还可以进一步修改。

⑤ though 尽管：“尽管……”与“但是……”是一对关联词，要不要加上“但是”呢？现在句子中分句较多，为了明确转折点，加上较好。加在“由于个人……”前面。

⑥ “根本无法按时行动”与前后两个分句都相应地形成因果关系，是说“由于……，因而……”，“由于……，由于……，因而……”，还是“由于……，因而……”呢？看来第三个说法比较简洁而易懂，所以就不要再改动。

⑦ 最后一个分句可以加上语气词“就”和“了”，突出这个最后的落脚点。

经过上述修改，句子变成了：这支步兵尽管在数量上享有六比一的优势，但是由于个人负重量很大，根本无法按时行动，因而在一天内就损失了六万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翻译的过程归纳为这样两种思维活动：一种是发挥英语知识和背



景知识的作用来理解原文，脑子里显现出与英语原文相对应的汉语的意思；另一种是发挥逻辑推理和汉语知识的作用，在汉语表现形式方面进行加工，逐渐得出一个比较满意的汉语译文。通过这样一个紧张的思维活动过程，对作者的写作思想就能够逐步做到比较深入的理解和比较完善的表达。如果我们把这个认识补充到前面给翻译所下的定义里去，就可以说：“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它是一个对原文含义的理解逐步深入、对原文含义的表达逐步完善的过程。”

二、翻译的方法

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具体表现为对原作的语言形式进行一系列的转换。所谓“翻译的方法”指的就是进行这种语言形式转换的一整套原则和技巧。

在翻译实践中，当我们阅读原文以了解其内容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原文的词语搭配和句子结构把句子各个部分换成相对应的汉语。但在思考这些汉语词语时，脑子里不知不觉地已经对原作的表现形式作了一些初步的转换。例如：(All these things were so obvious as to be axiomatic; there was no quarrel.) But from that point on we encountered the obstacle on which all discussions split and practically exploded in our faces. 这个句子看过以后，我们脑子里反映出来的是：“但是从这里再前进一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讨论都由于意见不一致而分裂，而且几乎当了我们大家的面爆炸开来。”这里面包含了这样的变换：

- ① From that point on 里的副词 on 由“向前去”改变为“前进一步”。
- ② The obstacle 里的冠词 the 由“这个”换成“一个”。
- ③ in our faces 里的介词 in 不译为“(面)对……”而译为“当……(面)”。

这样一个汉语句子，对译者本人来说，已经初步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但是，一般的读者会感到这个译文还不太清楚，也不够通顺，因为这里面所体现的仍是英语国家人的思想方法和英语的表达方式。比如说，“讨论”竟然会“分裂”，甚至会“爆炸”。因此，我们就要在这个基础上有意识地按照汉语的习惯用法和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对句中的词语搭配和句子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变动。这里面包括：

- ④ All discussions split 里的 split 由“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讨论都由于意见不一致而分裂”改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讨论都使大家发生分歧”。
- ⑤ (all discussions) practically exploded in our faces 里的 exploded 由“(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讨论都)几乎当了我们大家的面爆炸开来”改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讨论都)使大家几乎当面吵了起来”。

整个句子变成：“但是从这里再前进一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讨论都使大家发生分歧而且使大家几乎当面吵了起来。”这样，句子通顺多了，但是读起来还有点啰嗦，可以使它简炼一点：

- ⑥ “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讨论都”改为“每次讨论都”。
- ⑦ 把第二个“使大家”删去。

全句最终成为：“但是从这里再前进一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每次讨论都使大家发生分歧，而且几乎当面吵了起来。”就这样，原作的文字形式被逐步转换成了既能表达原文含义而又符合汉语规范的译文。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在翻译过程中，原作的文字形式要在不同的阶段接受各式各



样的变换和调整, 比如:

① 初读原文时的少量的变换, 如 (1) 的 on, (2) 的 the, (3) 的 in, 为的是使话语连贯起来。

② 有了与英语句子相对应的汉语初稿后, 为了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得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作的调整, 如 (4) 的 split 和 (5) 的 exploded。

③ 汉语文字上的最后修饰, 如 (6) 和 (7)。

以上两个例句的分析, 就是我们所说的“翻译的方法”。具体的做法可以有许许多多, 但总的来说是一个如何发挥自己的语言修养与技巧和逻辑推理能力的问题。

三、翻译的标准

在实际工作中, 对原文含义的理解和表达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符合要求呢? 一般认为,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确切地表达出来, 而且要表达得清楚, 让读者看得明白。前面一个要求就叫做“忠实”, 后面一个要求就叫做“通顺”。

比如, 翻译: *The heavily laden infantry, though enjoying a superiority of six-to-one, simply could not keep to schedule and lost 60 000 men in one day.* 开始是译为“这支负载很重的士兵, 尽管享有六比一的优势, 完全不能遵守时间表, 并且在一天内损失六万人。”后来被改译为“这支步兵尽管在数量上享有六比一的优势, 但是由于个人负重量很大, 根本无法按时行动, 因而在一天内就损失了六万人。”这样, 从形式上看, 句子中的一部分移动了位置, 由定语变成了状语, 而且增加了“由于”这个词, 与原文的结构不一样了。但实际上是把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理顺了, 把原文的真正含义更确切地表现出来了, 这在翻译实践中称为“忠实”。当然, 第一个译法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忠实”的, 但那只是在形式上的忠实。好的翻译不是只讲究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形式, 而是要求忠实于原文的真正含义。

又比如, 翻译: *Primarily the Allied task was to utilize the resources of two great nations with the decisiveness of single authority.* 有人曾译为“盟国的任务主要的是以统一领导的果断性来使用两个大国的资源。”后来被改译为: “盟国的任务主要的就是在一个统一的领导下果断地使用两个大国的资源。”这样, 词语并没有变, 位置也没有挪动, 但是结构有了变化, 使译文符合汉语规范, 便于读者抓住原文的精神实质。这在翻译实践中称为“通顺”。原来那个译文完全是照搬原文的结构, 体现的仍是英语国家人的思想方法和英语的表达习惯(如用“统一领导”来修饰“果断性”), 虽然译者自己感到很清楚, 可是读者看了以后不明白作者到底想说什么, 这就是不通顺。

总之, “忠实”和“通顺”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对译文质量的基本要求。要达到这个基本要求就必须: 抓住原文的真正含义, 但不要受原文结构形式的束缚, 而是按照汉语习惯用法来安排译文。比如: *He called it “Pacific”, because he found after his voyage around South America.* 可以译为: “因为他驾船从南美洲绕过来以后发现海面上风平浪静, 就称它为‘太平洋’”, 而不要译为: “由于他在绕过南美洲的航行之后发现海面上风平浪静, 就称它为‘太平洋’”。又比如: *The engine burning enabled the speeding spaceship to fall out of orbit and was triggered after the astronauts flipped the Columbia over so that its nose pointed backwards.* 可以译为“宇航员在点燃火箭发动机之前先让哥伦比亚号翻了个筋斗使机头朝后, 然后再点燃发动机, 使高速飞行的航天飞机脱离轨道下降。”而不要译为: “宇航员点燃火箭发动机使高速飞行的航天飞机脱离轨道下降, 在点燃发动机之前他们让哥伦比亚号翻个筋斗使机头朝后。”

除了“忠实”和“通顺”以外, 在翻译时还要做到译文的语体与原作一致, 并适当注意



把原作的修辞手段反映出来。应注意避免两个倾向：一个是喜欢使用文言文词语，译文中文白混杂，读起来不通顺，意思也不清楚；另一个是喜欢堆砌词藻，尤其是四字成语用得过多，往往把原意歪曲了。

第二节 可译性及可译性限度

翻译理论中所谓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是指双语转换中原语的可译程度，它高于方法论，属于对策论课题。可译性问题历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就双语表层结构诸如文字形态、表层形式设计而言；第二种解释集中于语义，包括隐喻问题、文化翻译中的意义转换，这是中介层级的可译性问题；第三种解释以德国的翻译理论家本杰明(W.Benjamin, 1955)的观点为代表，可译性指双语最深层的意蕴上的相通相应，因而可以互补互证。

可译性涉及的问题很多，如思维认识论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思维形式问题以及可译性限度。后者又涉及语言文字的结构特征、语言的模糊性、思维表达方式及惯用法的民族独特性、方法论的功能局限性、翻译的层次论，等等。本节不可能对以上诸多问题一一详加阐述，只力求对某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作概略的论述，即以可译性理论依据及可译性限度为重点，适当涉及其中的某些比较典型、比较突出的具体问题。

一、可译性的理论依据

可译性的哲学依据是同类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维根斯坦称之为“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语言尽管各异，但它们都属于一个“家族”——人类的语言交流工具，它们之间必有“家族相似”。

从语言本身来分析，语际间存在着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转换通道”(channel for message transferring)。正是信息转换通道提供了语际转换的可译性，而在信息通道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时，就产生了可译性限度，这就是语言之间的非相似性。

(一) 认识所指的基本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基本同构”原理

如前所述，人在客观世界中的认识对象(即万事万物)在语言符号学上称为“所指”。同一所指在人的头脑中构成同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会因人所说之语言不同而从内涵上相悖。说不同语言的人根据各自的约定俗成法则给万事万物以不同的语言符号，实际上表示同一概念内涵。语言符号虽然是“任意”的，但它们所代表的事物或物质实体从基本上说却是对等的。说不同语言的人对客观事物或物质实体的认识虽然可能各有其不同的认识特征(包括运用不同的感官手段、强调不同的感应效果等)，但是他们的认识依据，即物质基础是同一的。这种同一性可以使他们在各自的头脑中构成一个疏略的但基本相同的概念系统框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概念系统框架”就是语义系统，在思维认识论上称为“同构”(isomorph)或“基本同构”(the basic isomorph)。“同构”是人类意识相通的基本的思维结构机制，是说不同语言的人能够通过语际转换，进行思想感情的相互传递(communiation)的基本条件，即存在着信息转换的通道。这是翻译理论中的“可译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说不同语言的人基于同一个外部世界，凭借“同构”的思维结构框架，互相对应，因而意识相通，也就是说，信息转换通道相通，双语可以互译。



(二) 思维形式的同一性

说英语的人运用英语语法概念以演绎推理形式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是不会互相抵触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思维逻辑形式基本上相同。同样,归纳推理也可以使说任何一种语言的人对同一现象得出相同或相近的推论。比如,不论英语或汉语,复句的连接模式大都有修饰关系、转折关系、假设关系、条件关系、因果关系、让步关系,等等。对不论说什么语言的人来说,“因”与“果”尽管可能有表达上的先后之分,但不可能有性质上的差别:说汉语的人心目中的“因”,不可能成了说英语的人心目中的“果”;“房屋因失火而焚毁”,不可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成了“房屋因焚毁而失火”。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维的交流离不开语言这个工具,语言则是思维的物质载体。尽管不同语言之间的语法结构并不相同,结构形式和叙述方式和风格可以变化无穷,但思维的规律则是相同的。思维的基本活动形式的同一性是构成语际转换的可能性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三) 语法差异的规律性及语义系统的对应

人类认识所指与思维活动形式的同一性构成了语际转换信息通道相通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人类思维的内容与基本形式是同一的,因此,在转换中的语言是“可译的”(translatable)。但是思维规律与语言的结构是两回事。相同的思维内容与思维规律可以表现在结构迥异的语言中。问题是,既然双语在语法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双语之间是否仍然存在着“信息转换通道”呢?回答是肯定的。人类的语言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反映的都是客观的外部世界,而且他们的思维活动规律也是一致的。因此,人脑中的内部言语以及发之于外的日常语言与外部世界形成了同构的作用链,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和现实。这时,虽然作为思维载体的语言在语法结构上双语存在差异,但是,第一,语法的基本成分和功能是大体一致的,即都有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定语等成分,发挥大体相同的功能;第二,语法成分的形态结构或形式虽然可能各不相同,但它们之间的配列式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即总是取以下的搭配组合形式:SV-VS(主谓-谓主)、SVO-SOV(主谓宾-主宾谓)、SVA-ASV(主谓状-状主谓),等等。第三,由于语法成分配列不出有限的基本形式,因此,由这些配列式所承载的意义也不会超出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语法成分配列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总体语义内涵。

在双语转换中,尽管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表述形式特征,但语际间具备了大体相通的、对应的语义结构。尽管在赋形于外部语言时不同的语义结构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但就核心句基本框架和总体内涵而言,双语是相通的、对应的。这就给语际转换提供了信息通道相通的基本可能性和物质的条件。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字结构及语法成分的组合形式的差异表现出规律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双语的对比研究,探索出语际转换的种种使信息通道相通的途径,使可能性尽可能地转化为现实性。例如,通过语序和词性的变通或调整,我们可以获得双语在语法成分配列上的对应式,进而通过词语语义上的变通或调整获得双语在语义上的对应式。此外,我们还可以以通过语序、词语及超句群体式上的变通或调整,尽最大可能地获得双语语段(语篇)在风格上的对应。可见,变通或调整是双语转换中弥合差异的杠杆和基本手段。

(四) 文化的相互渗透性

语言的转换还有其社会因素为之提供信息通道,这就是文化的渗透性。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社会愈发展,语言之间的接触(language contact)愈多,相互渗透的现象就愈加突



出。英语的发展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英语与罗曼语(the Romanic Languages)尤其是其中的法语之间的可译性范围最广,原因是1066年诺曼人(Normans)入侵不列颠,诺曼人的侵入使大量法语词汇渗入英语并被英语所吸收。这个从渗入到吸收的过程在词汇学中被称为“grafting”(移植)。至15世纪初,英语中从法语移植的词语已占全部外来语的近半数。诺曼人的进入还使当时先进的基督教文明深深地植根于英国,从而形成了英国从人种、语言到文化与欧洲大陆交融并进的历史性发展趋势。

可见,社会的开放对语言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不言而喻,社会愈开放,本族语与外族语接触愈多,渗入愈多,相通之处愈多,可译性也就愈大。在双语学中,由于语言接触而引起的本族语对外来语的同化、吸收现象称为异化(alienation)。毫无疑问,语言的这种适度异化对双语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异化可以拓宽双语之间的共性,消除双语之间在某些具体的表达方式方面的差距,使双语转换中的冲突转变为平行或对应,从而缩小了可译性限度。毋庸赘言,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适度,超过适度的异化,是任何自然语言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不能接受的,也必然会受到排斥。任何自然语言通过约定俗成和语言本身的内部机制都能产生一种对“超适度异化”的排斥力,这种由社会约定性造就的社会对语言的管束作用,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的“自洁作用”。

以上四个方面是双语转换中的可译性的理论依据。翻译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把握双语转换的基本作用机制,从上述理论依据出发,探求双语转换中的种种对应信息和非对应信息及信息转换通道,并理论化为程序论和方法论。

二、可译性限度

可译性限度产生于语言家族之间的非相似性。

前面我们论述了语际转换中的可译性问题,这是转换的对立统一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正因为可译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信息转换通道是客观存在,一切正常的翻译活动才可能进行,语际的有效的意义转换才能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但是,必须看到语言的同构是一个相对概念,可译性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可译”不是绝对的,它有一定的限度,在语言的各层次中并不是处处存在着信息相通的通道,这就限制了有效转换的完全实现。这种限制即所谓“可译性限度”。

(一) 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性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物质形式。语言与思维是紧密联系的,它的基本职能是作为一种符号在社会交际中传递信息。在社会交际中的各种信息的核心是语义信息,语义信息不可能得出精确的“定量”。语际转换中语言符号的行为模式也导致原语与译语的所指内涵不可能做出精确无误的“定量分析”。凭借当今的科学手段,我们甚至还不能准确地描写人脑中关于语言生成、语义加工以及语际转换的生理—心理机制,更谈不上推导出“等值转换”的方程式。由于我们不可能测定语义信息的定量,在语际的转换中既然不存在保证“等值”的方程式,转换的结果就只可能是非定量的、相对的“可变体”。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意义丧失”。因此,所谓“等值”就失去了作为翻译标准的严谨的科学性。

下面,我们再从同构的相对性与语言的模糊性来论证绝对的等值翻译之不可能。

在这里,同构的相对性有两层意思。我们在前面说过,原语与目的语都反映同一个外部



世界,因此,双语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性,思维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因而存在着可译性。但是这种同构关系是相对的,可译性也是相对的。原因是原语所反映的外部世界是原语作者经过自己的头脑“加工”过的,这种“加工”常常带有疏略性和主观局限性。外部世界与原语对它的描述之间只存在相对的同构关系。换言之,原语所描述的外部世界只具有真实的真实性。同构的相对性还有另一层意思,即译者对原语的认识(包括理解与对风格及情态的体验或感应)与原语所蕴含的意义之间只存在相对的同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原语所蕴含的意义不能完全为译者所领悟、所发掘。特别是在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中,作者常有尽在不言之意,这种“辞不达意”可以说是翻译中的常规。

除了同构差异、语义含蕴差异之外,还有一个语言本身的模糊性(fuzziness)问题。语言的模糊性是指词义本身界限不明,无法用分类逻辑(class logic)对之划出泾渭分明的界线。而且这种“不明确性”也不能用上下文的联立关系来加以限制或排除。比如,light color(淡色),究竟“淡”到何等程度才算“淡色”,一般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的概念是笼统而模糊的,“淡雅”就更模糊了;又如,light breeze(轻风),程度界限也是模糊的,如果要明确“轻”的程度,必须说明是“二级风”,但即使是“二级风”,这个概念对一般非专业读者来说也是模糊的,要进一步明确化,还需说明:“轻风”是“在自由海面掀起0.2米至0.3米的浪高、在距地10米高处风速为每小时6至11公里或每秒1.6米至3.3米”的风。可见,语言的精确性只是一个变量。有些变量可由上下文加以限制,以排除其可变性;有些变量则无法用上下文加以限制,排除模糊性。变量可以产生模糊性,而模糊性则正是一种交际手段(communicative device)。语言如果缺乏模糊性这个交际手段,就必然会失去语言作为“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的本质属性。

运用模糊性的语言作交际手段是导致可译性限度的基本原因之一。我们在英汉词义的对比中可以看到,汉语词义比较具体、精确,量词很多但语义范畴偏窄,有时甚至比较凝滞,不宜于表示模糊的“变量”。比如,甲、乙二人见面。甲身边有一位年龄与他相仿的女性。这时,乙对这一女性的认识即存在很大的相对性(同构的第一链节: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实际上,这一认识所指在乙的大脑内部言语中所形成的同构仅仅是“一位与甲年龄相仿的女性”,其他的都是变量:她既可能是甲的妻子,也可能是他的女友,还可能是姐妹,等等。因此,在同构机制的第二链节(乙的大脑对内部言语即概念系统的表述)中,乙有很多“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识。这时,如果甲将这位女性介绍给乙而称她为Ms(有意不确定婚姻状态的美语女性称呼语),甲的描述就构成了语言上的模糊性,这时,如果甲进一步将这位女子介绍为sister,语言上的模糊性也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在英语中,sister既可能是“姐姐”,也可能是“妹妹”,还可能是“堂姐妹”或“表姐妹”,等等,这时进行双语转换,就出现了可译性限度。这类词语还有很多,brother,uncle,aunt,parent(不是parents),father-in-law(公公、岳父、丈人),mother-in-law(婆婆、岳母、丈母娘),等等。

必须指出,语言的模糊性与可译性限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前者可能导致可译性障碍,也可能并无障碍,比如前面说的“淡雅”、“轻风”,原语与目的语都是模糊的,也就是说:可能用模糊性译语译模糊性原语,即方法论中的所谓对应。但是,从双语学的角度说,就汉英对比而言,英语词义与思维表述方式比较灵活、抽象、含糊;汉语词义与思维表述方式比较执著、具体,有时过于明确、凝滞。因此,语言模糊性确实可能为英汉互译带来困难。



(二) 语际转换中的障碍

可译性障碍具有种种不同的性质,我们将分类加以阐明。

1. 语言文字结构障碍

语言表达上的结构或手段(也可以称为文字结构或文体上的障碍),是最常见也是最难逾越的可译性障碍。原因是,语言结构通常体现出某一语言文字的结构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一般只能在同族语言或同族语言之间找到对映体,因为同系语言之间常常出现语符的共用现象,即语符的“移植”,不需要完全换码,而类似转换却很难在非亲属语言之间实现,因为非亲属语言之间语符需要完全换码。这就是说,在非亲属语之间进行转换时,结构上的语言手段(如符号形态)显然不存在信息相通的渠道,因而具有明显的可译性限度,有些甚至是不可译的(untranslatable)。比如,音韵上的结构性手段虽然可以在语义层实现双语转换,但完全无法实现语音层的双语转换。例如,狄更斯在小说 *Little Dorrit* 中有一段音韵上的修辞设计:

“Father” is rather vulgar, my dear. The word “Papa”, besides, gives a pretty form to the lips. Papa, potatoes, poultry, prunes and prisms, are all very good words for the lips; especially prunes and prisms.

文中第三句连续五字以 p 开头,形成所谓首韵法(alliteration)修辞格。首韵法常常用于加强听觉效果。如果说首韵法在印、欧语之间转换尚属可能,那么在英汉转换中就完全不可能,因为汉语中没有可以构成首韵的文字结构条件。汉语中有所谓“联绵词”,即双声叠韵词,如“窈窕、彷徨、逍遥、澎湃”等,声韵铿锵绵延,但在汉译英中却不得不放弃这种产生音韵效果的修辞手段。汉语中还有些词利用汉语特有的构形条件构成,如“妯娌”、“玛瑙”、“踟蹰”等,具有独特的汉字形体美。翻译中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寻找目的语的形体对应。英语中有不少类似汉语联绵词的所谓“doublets”(并联词组,也有人译为“成对词”)。有些是固定并联,有些是自由并联;有的着眼于音,有的着眼于形,如 weal and woe (祸与福)、odds and ends (零零星星的东西)、part and parcel (重要的组成部分)、thick and thin (历尽艰辛地)、by hook or by crook (不惜一切地)等。从这些并联结构的汉语翻译中可以看出原文中的音一形修辞立意很难在双语转换中实现转换。词语的机巧运用(近形、谐音等)也可以形成可译性障碍,例如:“Any stigma will do to beat a dogma.” (Guedalla),可惜这类常常颇具匠心的修辞设计在语言转换中无法表现在文字体系根本不同于原语的目的语中。音一形修辞立意双语转换中丧失的原因是语言表层(语音结构层)不存在双语转换的信息通道,双语的对应是在语义结构层进行的,双语的语音之间不能实现有意义的对应。

由于双语间表层(音、形)没有意义的信息转换通道,因此,在非亲属语之间,音、形不可能形成同源对应(cognate equivalence);汉英属于非亲属语,语际转换只能在语义结构层实现。下例英语中着眼于音、形的修辞立意都是“不可译”的:“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 (Mark Twain, 四个“sl”连用以加强作家的厌恶感);“his soul swooned slowly as he heard the snow” (James Joyce, 五个“s”音连用,以徐缓的语流渲染作家的漫漫悠思),这时候,原语中音、形、义三者已经结合在一起了,但在双语转换中,这种“三结合”构成了信息转换通道障碍。汉字的视觉和听觉分辨率都很高,汉语中音、形、义相结合的例子就更多了。李清照的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具有独特的“三维”美感。美国当代诗人肯明斯(E.E.Cummings)常常利用拆析的字母构成诗句,以唤起人们的“意象”。上面提到的作家詹姆士·乔伊斯也常以奇特的文字结构和句子记录“潜



意识”，导致双语转换障碍。

双关语是因音、形手段构成可译性障碍的又一例证。双关语利用异义、同音（或谐音、近音）、异形（或同形、近形）构成“隐语”即“语义双关”。由于语际转换只能在语义结构层实现对应，结果造成“双关”立意的丧失。比如“*She's too brown for a fair praise.*” (Shakespear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中的 fair 就是一个双关语。句中它的词义有两个：一是“白皙的肤色”中的“白皙”，二是“公平”。结果，在原语中构成的语义双关在译语已经丧失：“她皮肤黝黑，说她‘白皙’未免过奖了”。汉语中的双关语也同样具有可译性障碍。著名的例子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绝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诗中的“晴”，与“情”构成双关，无法英译。

一切形式的文字形体修辞手段都可能构成无法逾越的可译性障碍。汉语有许多楹联、骈句都属于这类手段，如“国士无双双国士，忠臣不贰贰忠臣”（杭州岳祠对联）。英语中也有许多借形寓意的修辞手法，如“*Homer wrote the Oddity.*”中 Oddity 是有意与 *Odyssey* 谐音近形，以造成谐谑。可惜的是，在双语转换中原文作者借形（音）寓意的匠心有时难以表述于译文中，结果只好牺牲形式意义、谐音寓意及暗含情态。词语修辞设计通常伴随某种情态色彩，在双语转换中则常常带来情态色彩的丧失。以下原句很有幽默感：“*Dogmatism is puppyism coming to its full growth*”，妙处在 dog 是“狗”，puppy 是“小狗”，“coming to its full growth”（成长壮大）才有幽默感。但译成汉语时，只好守住概念意义，形象意义与幽默感尽失：“墨守成规是妄自尊大的必然结果”。

信息理论证明，文字表现（图形结构）所具有的意义传播能力的平均率是 25%。各种语言可因文字结构特点之不同而具有或高或低的意义传播能力。汉字方形信息是三维的，其视分辨率很高，信息量很大。汉字可以以“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这是有汉语参与的双语转换中汉语形式意义转换的基本障碍。

2. 惯用法障碍 (Usage Obstruction)

惯用法的核心问题是语言社会性中的约定俗成，即惯例规范 (accepted norms)。惯例规范不“服从”语法和逻辑意念，受到一定的语境功能的制约；其中有文化背景、心理素质等作用机制。语言中的词句该怎么用，取决于语境的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每一种语言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惯用法可以导致信息转换通道的阻塞及语义对应关系的丧失而构成可译性障碍。

(1) 词语搭配 (Collocation)

惯用法普遍表现在词语搭配中。诚然，词语搭配的内在关系是语法的结构。除了语法结构关系以外，决定一个词必须与某一个词搭配而不与另一个词义与之相同（或相近）的词搭配的理由，则是惯用法规范。搭配的定式化是社会的约定俗成的结果。比如，我们常说“油漆剥落”、“皮毛脱落”。“剥落”与“脱落”其实是近义词，但在特定的语境中它们必须各得其所，不能任意更换。

由于惯用法各异，汉英主谓、述宾、名词与量词以及偏正之间的搭配在转换中都可能产生可译性障碍。这时，译者为保证译文的最佳可读性而不得不采取差强人意的变通手段，从而导致种种意义丧失。

a. 主谓搭配 (SV)

主语与谓语的搭配中主语对谓语动词的选择性并不完全取决于逻辑意念，还有以惯用法



为理据的语境机制。在很多情况下似乎都是惯用法规范在起作用。比如在汉语中种种天象虽然都与“发生”、“开始”的意念搭配，但各有其约定的搭配式，如“风起”、“霜降”、“雨落”、“云飞（涌）”、“雪飘”，等等。在双语转换中，惯用法可使主谓搭配丧失对应。以“树大招风”为例，“招”的意思是“招引”、“招惹”等。英语的对应词应是 *attract*, *induce*, *provoke*, *incur*, *court* 等。但与“树”搭配，就只能用 *catch*（捉、抓）：*A tall tree catches the wind.* “招”的语义特征丧失了（“招”：“手呼也”，《说文解字》，十二上部）。例如，“琐事缠身”，“缠身”是个形象词，用它来表示“动弹不得”的意思。这句话的英译是：*Trifles take (waste) up one's time.* “缠身”的形象效果和意义完全丧失了。英语中这类例子也很多，例如：“*A bad workman quarrels with his tools.*”句中“*quarrel*”受语境限制，翻译时只能引申为“责怪”：“手拙怪刀斧”。“*His anger sleep now.*”意思是“他的怒气消了”，*sleep* 的形象喻义已在转换中丧失：因为在汉语中，“气”只能“消逝”，不能“安眠”。

b. 述宾搭配 (VO)

动词与宾语的搭配（在句法中叫做“述宾搭配”）是词语搭配中最活跃的现象，也是约定俗成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种搭配，似乎无规律可循。一般来说，动宾搭配中活跃的成分是搭配中的动词，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大抵都是以作为宾语的名词去配作为谓语的动词；名词比较稳定。试悉心体会以下词语中动词的动势感：抚琴泼墨、吟诗作画、飞针走线、呼风唤雨、翻老账、敲竹杠、寻短见，等等。英语也不逊色于汉语，比如下句中的动宾搭配，其中的动词都具有很强的动势感：*A greeting card can warm a heart, hold a hand, lend an ear, pat a back, light up a face, tickle a funny bone, dry an eye, surprise a child, woo a sweetheart, toast a bride, welcome a stranger, wave a goodbye, shout a bravo, blow a kiss, mend a quarrel, ease a pain, boost morale, stop a worry and start a tradition*，共有 19 个。在这些述宾搭配中，语义信息的主体是作为宾语的名词，名词之所以稳定是由于语义稳定，起主轴作用，因而被称为“中心词”。动词动势感强，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搭配功夫又在动词。在语句生成的思维活动中，逻辑意念一经确定，惯用法即起调节作用，搭配词通常是最符合约定俗成的动词。由于惯用法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双语转换中述宾搭配有时不存在信息通道，造成可译性障碍。上述英语例句约有一半 VO 不能实现对应式转换，比如 *wave a good-bye* 译成“道声再见”失去形象意义，*blow a kiss* 译成“送你一个吻”，*mend a quarrel* 译成“平息纷争”，*stop a worry* 译成“消除焦虑”，*light up a face* 译成“抹去愁容”，都属于失去原语的概念意义，大抵都需将形象意义转化。

c. 量词与名词的搭配 (MN)

现代汉语中量词丰富多彩，与名词的搭配式千差万别，结合面也相当广（有具体名词，也包括抽象名词）。英语没有量词类，但对应概念还是有的。在很多情况下，汉英对应契合，例如，一线希望——*a thread of hope*，一阵严寒——*a spell of cold*，一把米——*a handful of rice*，一队驳船——*a fleet of barges*，一卷柯达胶卷——*a reel of Kodak film*，等等。计量性量词的对应式就更多了，转换时几乎没有丧失什么意义。

但描写性量词在转换中的可译性障碍就比较明显，顾及译语的可读性和约定俗成就顾不到原语的概念丧失或感情色彩的丧失。比如，英语中 *a round of beef* 里的 *round*，意思是“圆筒形物体”，有外形描状。但汉语只能译为“一块牛肉”，外形描状丧失。汉语“一派好风光”与“一派胡言”中的“派”暗示宽度、广度、强度、鲜明度，含有感情色彩。但英译时“派”的暗含义完全丧失，前者是 *attractive scenery*，后者固然可以视情况译为 *a pack of nonsense*，但其中的



pack 已属于计量性而不具有描写性了。这样的例子极多。例如, a whiff (声色词) of fresh air 只能译成“吸口新鲜空气”, 汉语的“一缕情思”中的“缕”暗含纤细、悠长、剪不断等义, 但英语无法表述, 只能译成 tender regards, 给译者留下的是一种心声未尽的遗憾。

d. 偏正搭配 (MrMd)

偏正搭配是修饰语 (modifier) 与被修饰的中心词 (modified) 之间的搭配。双语惯用法在这里的差异可能很大。此外, 在转换中修饰语的准确对应常常被视为“无关宏旨”而被舍弃, 以保证最佳可读性。其实, 修饰语不符合语感在语流中是很刺耳的, 一向被词章学家视为“败笔”。以下偏正搭配中形容词均已失去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对应: win a narrow victory 险胜, shallow laughter 淡然一笑, fancy shops 高级商店, proud flesh 赘肉, lavish endearment 有失分寸的热乎劲。汉语“新春”指旧历春节后一二十天, 承载文化信息; 英语中无对应式, “new spring”的“new”是一个很泛的概念, 不承载特殊的文化信息。

(2) 成语结构或惯用语结构 (Idiomatic Structures)

各种成语结构的可译性通常有一定的限度, 因为成语是惯例规范表现得最充分的例证。无论是在英语中还是在汉语中, 许多成语都是历时惯用法的产物, 是经历了长期的实践运用并见于典籍才流传、确定下来的, 因此与特定的社会语境紧密相关。各类成语及惯用法的共同特点是结构上的稳定性、语义上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 以及暗含的情态表达力。

英语成语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以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 即多义性。许多成语即便在词语联立关系中也很难确定词义。汉语成语语义凝炼、结构严谨, 富于哲理与文化色彩。英汉成语在双语转换中都普遍存在各种意义丧失。

3. 表达法障碍 (Expression Obstruction)

表达法是一个很广泛的范畴或系统, 下面我们只讨论五个方面的问题。

(1) 正说与反说 (肯定与否定)

在大多数情况下, 汉英的正说法与反说法是相似或相通的, 可译性并无障碍。但无论汉语或英语都有只能取否定式或只能取肯定式的强制情况。肯定式与否定式并无优劣之分。例如: 不动产 (汉语着眼于与可携带的证券、货币相比较) real estate (英语着眼于实体性、事物性); 不速之客 (“速”的意思是“邀请”, 着眼于主体即说话者的行为或意向) a shadow (英语着眼于客体的行为性状); 出众的 (汉语着眼于主体的态势) uncommon (英语着眼于说话者对客体的评价), 等等。但在下列情况下, 正说与反说确有细微差别:

① 反说具有某种婉转性。比如汉语“其貌不扬”, 汉英翻译时往往译成 ugly looking, 其实“不扬”并不等于“丑”, 具有婉转性的反说法语义强度 (tensity) 低于正说法。这种例子很多, not rich 并不等于“穷”, unworn (没有穿坏) 不等于“新的”, underpay (付款不足) 不等于“付得太少”。词典的释义往往正说、反说并举, 但在不少情况下实际强度不同, 正、反互译可能出现意义丧失。

② 有时, 反说属于形式上的“折反”或反衬, 因此有形式意义, 但双语转换时往往难以照顾。比如莎士比亚有名的不定式短语“To be or not to be”, 利用否定形成折反, 比“To die or to live”优美得多。但这种有形式意义的结构往往构成可译性障碍, 我们不能将上述不定式短语译成“生或不生”, 只能译成“生或死”。汉语的“不多不少”, 英语只能译成 just the right amount, “不死不活” (It's dying.)、 “不高不矮” (medium height) 也是如此。